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5006

体认翻译学视域下《水调歌头》英译的认知差异与诠释路径
——以许渊冲与华兹生译本为例

刘锦晖，王硕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体认翻译学以“体”与“认”为核心，为解读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认知差异提供了本土化理论视角。以许渊冲与华兹生的《水调歌头》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对比分析法，从意象传递、内容阐释、韵律处理、句式结构四个维度展开剖析，探究不同译本翻译差异的深层认知动因。研究发现，诗词英译是译者基于“体”的共通性与“认”的差异性的动态体认活动，两位译者在自然物象等“体”的层面达成共识，却因文化背景、翻译理念不同，在“认”的层面呈现出差异化表达：许渊冲译本侧重文化保真与审美传递，力求还原原词的文学神韵与文化内涵；华兹生译本则追求译文的流畅易懂和传播效能，注重原词核心语义的精准传递。二者差异化的翻译路径与表达范式，从不同维度诠释了古典诗词英译的体认逻辑，共同丰富了《水调歌头》的跨文化表达维度。

关键词：《水调歌头》；体认翻译学；认知差异；意象传递；内容阐释；韵律处理；句式结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5-0049-09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宝库中，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恢宏的意境、深邃的哲思与真挚的情感，成为跨越时空的经典词作。该词以中秋明月为核心意象与情感媒介，串联起对宇宙本源的叩问、对出世入世的思索、对亲友离别的怅惘以及对人间团圆的期许，既彰显出宋代文人的精神品格，更承载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核，其独特的文学价值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早已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局限，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古典诗词的跨文化译介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课题。在《水调歌头》的翻译历史中，涌现了初大告、林语堂、黄宏荃、杨宪益与戴乃迭等诸多名家的英译本。如何更加准确、传神地翻译《水调歌头》，逐渐成为古典诗词英译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许渊冲的《苏轼诗词选》与西方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 *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 中对应的译篇，因译者文化背景与翻译理念的鲜明差异，成为中外古典诗词英译的典型代表；而这一多版本英译格局，也直观印证了苏轼词作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译介价值与热度。

国内学界对苏轼《水调歌头》英译的研究已形成多维度、多理论支撑的格局，成果丰硕。有学者以

收稿日期：2026-03-05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李清照诗词百年英译及译者行为研究”（HB23YY004）

作者简介：刘锦晖，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

翻译美学为研究视角，围绕原词的语音美、形式美、意象美、语法美与修辞美展开分析，深入剖析译者运用语言手段再现原词美学特质的路径[1]；亦有学者立足诠释学翻译观，以斯坦纳“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步骤为分析框架，探究译者对原词音美、形美、意美的挖掘与异域再现方式，探讨诗歌美学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延续路径[2]；还有学者引入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从及物性分析视角切入，通过对比不同译本中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等的分布与转换，揭示译者组织经验的认知倾向与语篇建构逻辑[3]。既有研究从美学、诠释学、语言学等多个层面展开，借助多重理论视角，拓展了《水调歌头》英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但其大多以文本为核心进行静态对比，或聚焦单一理论视角分析翻译效果，缺乏对译者、原文、文化语境与翻译行为的系统性探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体验与认知加工过程；部分研究虽提及译者主体性，却未深入挖掘译者对原词创作背景、文化内涵的亲身体悟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难以完整揭示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背后的深层动因。此外，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多聚焦于语言表层的转换问题，忽视了其背后的体认机制[4]2——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与原文、现实世界、目标语文化的多重互动关系。而体认翻译学的兴起，为破解这一研究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本土化理论视角。该理论认为，翻译活动必然涉及语言背后的“体”（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和“认”（心智的认知加工）两大核心机制，跨语言翻译中的词句转换，不仅涉及表达层面的技术处理，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其背后的“体”与“认”[5]。

基于体认翻译学的理论视角，本研究选取许渊冲与华兹生的《水调歌头》英译本作为核心分析对象。两位译者分别是中国本土诗词英译与西方汉学典籍译介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其翻译实践因文化背景与认知视角的差异呈现出鲜明分野，为探究“体”与“认”的运作机制提供了理想的对比样本。以此为基础，本研究从意象传递、内容阐释、韵律处理与句式结构四个维度，对两位译者的译本展开细致分析，旨在挖掘译本背后的深层认知动因，丰富本土化翻译理论的实践应用，并为中华古典诗词的跨文化译介与传播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一、体认翻译学理论概述

作为本土化翻译理论的重要成果，体认翻译学为破解传统翻译研究偏重语言表层转换、忽视深层认知动因的困境提供了关键理论视角。

体认翻译学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传入中国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 CL），但认知语言学存在未述及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对英美分析哲学反思不充分等不足，其学科名称也未体现唯物来源。在此背景下，四川外国语大学体认团队对其进行理论修正与重构，形成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 ECL），确立“现实 – 认知 – 语言”的核心原则，明确语言是“互动体验（体）”与“认知加工（认）”的产物，并在理论中融入唯物观与人本主义。基于认知语言学（CL）建立的“认知翻译学”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为在理论上明晰论述逻辑、在方法上实现取长补短，遂将其修正为“体认翻译学”。该理论强调“体”的基础性与“认”的能动性，认为二者相互补充，以人类共通的现实体验为基础，通过发挥主观认知加工的作用，实现跨文化翻译[6]。

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可概括为“同于‘体’而异于‘认’”。人类之所以能理解不同的语言，是因为各民族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且身体结构和各部位功能相同，在思维和表达上必有相同之处，同在“体”上；但人还具有主观能动性，各民族看待世界的角度和认知加工的方式必有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异在“认”上[4]2。因此，翻译活动绝非语言符号的简单对应转换，唯有透过表层语言现象，深入挖掘其背后的体认本质，才能实现高质量的跨文化翻译。

进一步而言，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运用多种体认方式（如感觉知觉、意象图式、范畴化与

概念化、认知模型、隐转喻、概念整合、识解等），将这些意义映射进译入语，并基于创造性模仿机制将这些意义建构和转述出来[7]。由此可见，“体”与“认”是体认翻译学的核心构成[8]，这一双重机制，恰好契合了《水调歌头》英译研究中探究译本差异背后认知因素的需求，为后续对比分析许渊冲与华兹生的《水调歌头》英译本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二、体认翻译学视域下《水调歌头》的英译比较

体认翻译学“同于‘体’而异于‘认’”的核心原理，为解读《水调歌头》的英译实践提供了关键理论框架。该词作的英译本质上是译者以原文为基底，对 “体”与“认”进行动态互动、融合共创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对原词体认内涵的跨语言再现，也是译者主观认知加工的创造性实践。这一原理不仅能够有效解释古典诗词英译中的译法差异，亦为评判译法的合理性确立了核心依据：翻译的底层逻辑始终以“体”所指向的现实物象与文本为根基，凡紧扣这一核心的译法均具备内在的合理性；而“认”则赋予翻译活动创造性特征，不同译者的认知差异最终外化为字词遴选、内容阐释、韵律建构与句式设计的具体分野，让同一原作的译本兼具共通性与独特性，进而产生差异化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与审美体验。

中国古典诗词英译领域的代表学者许渊冲，以“意美、音美、形美”的翻译理念为核心追求。从体认翻译学视角审视，其“三美”译法的实现，正是以对原词意境、文化内涵与情感内核的深度体验为“体”，以契合英语读者审美习惯的语言加工为“认”，这一翻译实践正是“同于‘体’而异于‘认’”原理的典型体现。西方汉学家华兹生明确提出，其翻译宗旨为将中国典籍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篇目，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出来[9]；其翻译的核心目标，是让英语读者尽可能便捷地接触到亚洲文化、文学与思想[10]。其翻译选择以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体验为核心导向，在精准把握原文核心内涵这一“体”的基础上，进行适配西方读者认知习惯的差异化加工，构成了“认”的独特表达，同样为体认翻译学的核心原理提供了实践印证。下文将从意象传递、内容阐释、韵律处理与句式结构四个维度，具体剖析“体”与“认”在两位译者《水调歌头》英译本中的具体表现。

（一）意象传递

意象是古典诗词的灵魂，是主观情志与外在物象相融合的艺术载体，兼具直观的形象美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承载着诗人的思想情感与哲理思考。《水调歌头》中塑造了诸多鲜活的意象，这些意象既承载着具体的现实意义，又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词作传情达意的关键媒介。本文将选取词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从“体”与“认”两个层面，探析两位译者对原文意象的翻译表达路径。

1. 体认共通

各民族面对的现实世界相同或基本一致，因此不同群体对客观物象的感知、思维逻辑与情感表达存在共通之处，这也为不同译者对同一意象形成体认共通奠定了基础。如对“明月”“青天”的翻译：

许译：bright moon; blue sky[11]105.

华译：bright moon; blue sky[12]67.

“明月”与“青天”是人类共通的体验对象，也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苏轼以这两个意象开篇，意在营造澄澈旷远的意境，为后续把酒问天的哲思与抒怀铺垫情感基调。两位译者在“体”的层面形成高度共鸣，翻译选择呈现出一致性，均以“bright moon”对应“明月”，以“blue sky”对应“青天”，既准确还原了意象的现实形态，又传递出“明月”的明亮感与“青天”的澄澈感。这种一致性源于“体”的共通性——无论中西方，人们对“明月”与“青天”的视觉体验与基本认知趋于一致，因此译者在“认”的层面无需进行复杂的文化转换，只需直接映射现实体验即可。这一高度契合的译法表明，当译者对原文的体验根基与情感指向形成共识时，其认知加工的结果也会趋于统一。

2. 同体异认

当源语与目的语的内涵相近，且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在具身体验与认知加工上趋于一致时，译者通过直译即可保留原文意象，这种处理本质上能够实现一致的认知具体化效果。反之，若受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现实语境及认知差异等因素影响，目的语读者难以理解源语意象，译者则需对其进行适当调整，在目的语体系中选取适配的表达，以确保原文的核心语义与作者寄托的情感体验在跨文化传递中得到有效再现。如对“琼楼玉宇”的翻译：

许译：crystalline palace[11]105.

华译：porphyry towers, under jade eaves[12]67.

“琼楼玉宇”指华美如珍宝般建造的空中楼阁和宫殿，兼具仙境的超脱意境，是苏轼凭借非凡想象力构建的既瑰丽又清寒的月宫意象。苏轼借这一意象寄寓了对天上仙境的遐想与疏离，既向往其澄澈超脱，又暗含对人间烟火的眷恋，这一复杂的情感内核正是该意象的核心所在，也是译者进行翻译认知加工的根本依据。这一意象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神话与审美传统，英语中并无完全对应的固定表达。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需结合中西方文化认知差异审慎选择词汇，既确保译入语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原文意象的内涵，又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的独特韵味与作者赋予的情感特质。

许渊冲在翻译中追求意象审美性与文化内涵的双重完整传递，其以对苏轼创作意图与意象情感内核的深度体认为前提，通过精准的英文词汇展开审美化认知加工，将“琼楼玉宇”译为“crystalline palace”。“crystalline”源自古英语中表“水晶”义的“crystal”，其能快速激活英语读者的水晶认知图式，使他们自然联想到冰晶构筑的奇幻宫殿，由此导向原词的仙境意境，译文精准还原了苏轼笔下月宫清寒瑰丽的视觉与情感体验；而“palace”一词则契合“琼楼”宏伟华贵之质。译者以简洁凝练的词汇组合，在英语中构建出与原词意境相符的审美意境，让西方读者通过具象化的审美联想，体悟意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华兹生认为，中国诗歌的精髓在于意象的清晰与精准[10]。其对“琼楼玉宇”的翻译同样立足该意象的核心内涵，但其在认知加工环节更侧重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体验。华兹生将“琼楼玉宇”拆解为“porphyry towers”（斑岩塔楼）与“jade eaves”（玉质屋檐）。其中，“porphyry”并非简单的直译，而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寻得的联想等效物：斑岩为古罗马帝王专属石材，象征着权力、神圣与永恒，与“琼”在中国文化中所承载的仙境、稀缺、高贵之意高度契合，是译者体认原文意象文化内涵后，针对英语读者的认知联想特点所做的精准加工；对于“玉”这一东方文化负载词，译者选择直接保留“jade”，因该词在英语语境中已形成一定的接受度与认知基础，读者由其能联想到东方精美工艺。再以西方读者熟悉的“塔楼”“屋檐”明确建筑属性，通过具象化、平实化的表达弱化文化隔阂，虽削弱了建筑的宏伟感与苏轼笔下仙境的超脱意境，却在忠实于“华美楼阁”核心语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了跨文化理解门槛，也反映了他在翻译意象时以目标语读者精准感知为导向的认知加工倾向。

再如对“婵娟”的翻译：

许译：the beauty she displays[11]105.

华译：the moon’s beauty[12]67.

“婵娟”融合自然意象、神话传说与人文情怀，核心指向“明月”，既蕴含与“嫦娥”相关的女性化人格特质及皎洁永恒之美，又承载着苏轼对亲人的团圆期许、相思慰藉与对人间的眷恋，是词作从“问天思仙”升华为“人间情暖”的核心意象。其背后的情感内核与主题升华，正是译者翻译时需牢牢把握的核心。

许渊冲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度体认者，精准把握了“婵娟”的多重意蕴与词作的主题升华。其英译“the beauty she displays”中，“she”呼应人格化联想，还原了苏轼将明月拟人化、以月寄情的创作手法，让西方读者能感知到作者对明月的情感寄托，这份精准的情感传递，正是源于译者对原文意蕴的深度体认；“beauty”一词则囊括月色、团圆与人间美好，既完整传递了意象的文化内涵与“意美”，又以灵动的表

达强化了译文的情感张力，既契合其“三美并重、传递文化精髓”的翻译追求，也实现了原文情感内核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有效传递。

华兹生则聚焦“婵娟”与“明月”的直接关联，以“the moon’s beauty”直白还原核心语义，避开了神话隐喻、多重情感寄托可能给西方读者带来的认知负担。他精准把握了苏轼借“婵娟”（明月）寄托相思、期许团圆的创作意图，紧扣词作情感内核，这正是“体”的体现；而其简洁直白的译法，是贴合西方读者习惯的认知加工，即“认”的呈现。这一译法，既忠实于原文的基本所指，又符合西方读者的认知习惯，确保了译文的流畅性与可接受性，也契合其翻译追求，即在翻译时“选择使用表达最清楚、听起来最舒耳的又尽可能符合现代英语的翻译”[13]。

无论是“琼楼玉宇”还是“婵娟”的翻译，两位译者均精准把握了意象的核心，这也是二者英译均具备合理性的根本原因。由于各自文化背景与翻译理念的差异，二人在认知加工的路径与侧重上有所不同：许渊冲始终以对苏轼创作意图、词作主题与意象情感内核的体认为基础，在认知加工时兼顾文化保真、审美传递与情感还原，其译法更能让西方读者体悟原作的文化内涵与情感温度；华兹生则以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体验为核心，在把握核心语义基础上，以平实化、简洁化为认知加工原则，其更注重译文的可读性与传播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作的审美特质与情感层次。这种异同正是体认翻译学“同于‘体’而异于‘认’”原理的生动体现。许渊冲的译法实现了体认相融，更贴合体认翻译学对诗词英译的核心要求；华兹生的处理方式同样符合这一理论的解释逻辑。二者虽路径不同，但他们的翻译都能在体认翻译学的框架下得到合理阐释，从不同维度印证了该理论对古典诗词英译的强大解释力。

（二）内容阐释

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容阐释离不开对文本情感内核与哲理意蕴的精准把握，而译者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与认知差异，会使其在面对同一文本时，形成不同的认知加工与表达选择。正如体认翻译学所强调的，人们面对同一“体”的生活场景，会产生不同的“认”，且在“认”的程度上也有诸多不同层次，自然就会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和语言表达[14]。

例 1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许译：The moon goes round the mansions red

With gauze windows to shed

Her light upon the sleepless bed.

Against man she should not have any spite.

Why then when people part is she oft full and bright?[11]105

华译：Circling red chambers,

low in the curtained door,

you light our sleeplessness.

Surely you bear us no ill will –

why then must you be so round at times when we humans are parted![12]67

这几句由景入情，将月光的移动与人的不眠之心相互映照，在对明月的诘问中寄寓了对人间离合的深沉感慨，情感细腻而意蕴幽远，构成译者体认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情感层次。

许渊冲在译文中赋予月亮以人格化的姿态，用“goes round”“shed her light”勾勒出月光移步徘徊的动态，使景物描写与人物心绪自然相融。面对苏轼对月亮的追问，他没有停留在字面的诘问语气，而是将其转化为贯穿全篇的抒情语调。这一处理不只着眼于形式美感，更来自对苏轼创作心境与内在情感逻辑的真切把握，其译文把原作的孤寂、怅惘与哲思融为一体，实现“体”与“认”的自然统一，这也让译文在情感传递上更具整体性与感染力。

华兹生则更注重对词句实景的还原，以“circling”“low”细致捕捉月光移动的层次，用“you light our sleeplessness”直写无眠之态，忠实呈现出原作的画面信息。他对原文的体认更多停留在外在场景与字面含义，将对月亮的诘问处理为平静而直接的倾诉，只传递了词句的表层意思，未能深入体认其中复杂的心绪与人生感慨，其译文更偏向对文本情境的客观再现。

在情景关系的处理上，许译以情驭景，在意境的铺展中自然流露内在情感；华译则以景写实，在细节还原的基础上呈现语句本意。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再次显现出两位译者在情感体察与意义再现上的不同取向。

例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许译：So let us wish that man live as long as he can! Though miles apart, we’ll share the beauty she displays[11]105.

华译：I only hope we two may have long long lives, may share the moon’s beauty, though a thousand miles apart[12]67.

该句是全词主旨所在，承载着苏轼对亲人的思念、对生命长久的祈愿与超越时空的人文情怀，也是译者在翻译时需重点把握的核心内涵。

许渊冲的译文中，“人长久”译为“man live as long as he can”，用泛指的“man”突破私人话语的局限，凸显出其对苏轼从个体思念升华为普遍生命关怀的创作意图的深刻领会。其译文将静态意象转化为对共同美好体验的共享，认知路径贴合原作的情感结构与主题升华，呈现出对原文精神世界的整体性把握。

华兹生则译为“we two may have long long lives”，保留了第一人称视角和重复的“long”，更贴近原文的个人化祈愿语气，体现出对原文人际语境与情感基调的细致体察。他将词句所指向的共同体验理解为对同一客体的共同观赏，其理解更偏向具体语境与表层意义，未能充分展现原作由小我情感走向大我关怀的精神超越。

两位译者的差异化翻译选择，证实了翻译活动是体认的再创造。他们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源于不同的文化身份和认知方式，这种差异也丰富了我们对原文的认知。二者均以原文情感为“体”，只是在“认”的路径与深度上各有侧重：许译更注重情感意蕴与主题精神的整体传递，体认更为完整通透；华译则偏向文本本义与具体语境的忠实呈现，对原文深层情感与哲思的体认相对有限。

由此可见，翻译的多样性，本质上是不同认知主体基于其具身经验与价值取向对同一“体”之世界进行的创造性“认”知重构。两位译者的实践既印证了体认翻译学对古典诗词英译差异的解释力，也显示出在诗词翻译中，唯有实现对原作内在世界与精神意蕴的深度体认，才能更完整地传达其文学神韵与艺术价值。

（三）韵律处理

中国古典诗词之所以能朗朗上口、流传千百年而经久不衰，重要原因之一为其具有极强的节奏性与韵律感。古典文人在创作中尤为注重声律格式的运用，其中押尾韵是核心手法之一。《水调歌头》的不同译本，其差异不仅表现在意象与内容处理上凸显了译者不同的认知过程，也表现在韵律传递中展现了译者各有侧重的选择。

例 3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许译：When did the bright moon first appear?
Wine-cup in hand, I ask the blue sky.
I do not know what time of year
It would be tonight in the palace on high[11]105.

华译：Bright moon, when did you appear?
Lifting my wine, I question the blue sky.
Tonight in the palaces and halls of heaven
what year is it, I wonder? [12]67

许渊冲的韵律策略，立足于对中国古典诗词本体特征的整体把握，他将格律音韵视作诗歌审美特质的内在构成，而非外在附加的形式。在此基础上，他主动在译入语中建构规整的音乐性框架，通过将原词的 [an] 韵创造性地转换为隔行押韵（如 appear/year, sky/high），在英语中再造原词的韵式美感。这并非简单“复刻”，而是以韵筑体，向英语读者传递古典诗歌的形式意蕴与音乐特质，其译诗也因此具有鲜明的诗学风格。

华兹生曾指出，“今天，美国诗歌押韵的极少，有人认为押韵古板、生硬，甚至是多余和害意。最多也就是部分押韵和半押韵。故此，翻译华夏古诗没必要押韵”，“如果执意押韵，尽量要自然，不要害义”[15]。以此为出发点，他更注重文本气韵与语气的真实流畅传递，认为强求押韵可能影响意义的自然传达。其翻译表现为弱化形式押韵，采用自由诗体与口语化表达（如“I wonder”），以破韵显体，确保开篇的旷达感与哲思能在英语语境中被自然领悟，优先保障译文的可接受性。

从体认翻译学的视角来看，两位译者虽共享同一文本之“体”，却在韵律认知与审美再现上呈现明显差异。许渊冲的韵律安排更贴近古典诗词的本体存在，将声律美感视作作品不可分割的部分，旨在更为完整地保留原作的诗性品格；华兹生则更侧重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以简化形式实现文本的顺畅传播。二者的翻译均有其合理性，但许渊冲的处理更能完整展现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审美特质，也更能体现体认翻译学对诗词传译的解释效力。

（四）句式结构

句式结构是古典诗词表情达意、承载哲思的外在形式，句式排布、对偶对仗是词作文体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调歌头》句式形态凝练工整，不同译本的句式重构各有特点，直观折射出译者差异化的文本体认与句式取舍。

例 4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许译：Men have sorrow and joy, they part and meet again; The moon may be bright or dim, she may wax or wane[11]105.

华译：People have their griefs and joys, their togetherness and separation, the moon its dark and clear times, its roundings and wanings[12]67.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以整齐对称的句式承载着深刻的人生哲思，形式与意蕴高度统一，构成词作中极具代表性的表达范式。

许渊冲的句式处理，紧扣原文“句式与哲思共生”的核心特质，保留并强化了对偶句式的对称感，使前后分句在结构上形成呼应，既保留了原句的形式美感，更令句式的均衡与哲思的整体浑然相融。他没有局限于中英文句式的表层对应，而是采用“Men have...”与“The moon may be...”的句式排布，既贴合中文对偶的本体特征，又适配英语的表达逻辑，同时以“she”赋予月亮人格化特质，在形式对称的基础上，进一步贯通了文本的内在气韵，使句式结构与哲思意蕴相辅相成。这种选择，本质是对原作“形式服务于意蕴”的深度体认，让西方读者既能通过对称句式直观感受原作的形质之美，也能透过句式逻辑领悟其中的人生哲思。

华兹生则采用更为灵活的名词性短语并列结构，在保留“人”与“月”基本对应关系的同时，弱化了严格的形式对仗。他的句式选择更贴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以简洁平实的排列呈现核心语义，避免因刻意追求形式对称而影响文本的自然流畅。这种以平实自然的表述传递原句基本内涵的处理方式，是华兹生基于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合理体认，展现出其注重文本在跨文化语境中可读性与接受度的翻译取向。

正如王建开所言，华兹生英译的特点是文笔通俗，不加注释，突出可读性，适合普通大众[16]。

两位译者面对相同的文本，在句式结构的认知与再现上呈现出不同取向。许渊冲以诗词本体的形式特质与内在意蕴为重心，其句式安排更能完整保留原作的对称美感与哲思气韵；华兹生则以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为重心，更注重语义传递的简洁顺畅。正是这种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与再现方式，构成了诗词翻译多样性的内在依据。相比之下，许渊冲的句式处理更贴近中国古典诗词的本体存在，也更能展现体认翻译学对诗词形式与意蕴共生关系的解释力。

本文以体认翻译学为核心理论基础，选取许渊冲与华兹生的《水调歌头》英译本，从意象传递、内容阐释、韵律传递与句式结构四个维度展开系统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水调歌头》的英译是译者以原词为基底，基于“体”的共通性与“认”的差异性展开的动态体认过程，两位译者在自然意象等客观物象的“体”之层面形成高度认知共识，却因文化背景、翻译理念的差异，在认知加工与表达转化的 “认”之层面呈现出鲜明的译介分野，这一翻译实践特征与体认翻译学“同于‘体’而异于‘认’”的核心原理高度契合。许渊冲在译介中兼顾文化保真与审美特质的完整传递，力求还原原词的文学神韵与文化内涵；华兹生则以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体验为核心，追求译文流畅易懂和传播效能，注重原词核心语义的精准传递。二者差异化的翻译路径与表达范式，从不同维度诠释了古典诗词英译的体认逻辑，共同丰富了《水调歌头》的跨文化表达维度。

本研究力求突破传统静态文本对比的局限，从体认机制切入，揭示译本差异的深层认知动因，拓展《水调歌头》英译研究的理论视角，为体认翻译学这一本土化翻译理论的实践应用提供实证支撑。因研究范围所限，本研究仅选取许渊冲与华兹生两个代表性译本展开分析，未纳入更多译者的译介实践进行对比研究。未来可进一步扩大译本样本范围，纳入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翻译风格的译者译本展开多维度对比；同时可结合跨文化传播的实际场景，探究体认翻译学视角下古典诗词英译的传播效果与接受机制，深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此外，还可将体认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更多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研究中，进一步验证该理论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1] 赵振华 .《水调歌头》译本的翻译美学探析 [J]. 语文建设，2016(30)：47−48.
[2] 张臻 . 诠释学翻译观视域下诗歌翻译探析：以《水调歌头》英译本为例 [J]. 译苑新谭，2017(0)：74−79.
[3] 伍仕秀 . 系统功能语法视角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四版英译本的及物性分析 [J]. 现代语言学，2024(6)：617−628.
[4] 王寅 . 基于体认翻译学重新解读直译与意译 [J]. 翻译研究与教学，2021(1)：1−6.
[5] 王寅 . 体认翻译学：回顾与展望 [J]. 翻译研究与教学，2024(1)：56−62.
[6] 王寅 . 体认翻译学在歇后语英译中的应用：以《红楼梦》三译本中歇后语为例 [J]. 中国翻译，2023，44(5)：133−139.
[7] 王寅 . 体认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 [J]. 中国翻译，2021，42(3)：43−49，191.
[8] 林琳，姚振军 . 体认翻译学框架下“体”与“认”的关系探究：基于心智哲学“体认一元观”的译学新思考 [J]. 中国翻译，2023，44(4)：39−47，192.
[9] Balcom J. An interview with Burton Watson[J]. Translation Review，2005，70(1)：7−12.
[10] Watson B. The pleasures of translating [EB/OL]. [2025−12−23]. https://m.keenecenter.org/download_files/Watson_Burton_2001sen.pdf.
[11] 许渊冲 . 苏轼诗词选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12] Watson B. 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M]. Port Townsend：Copper Canyon Press，1994.
[13] 华兹生 . 我在过去三十五年的翻译生涯 [J]. 译苑，2011(3)：12−18.
[14] 王寅 . 体认翻译学的理论与应用 [J]. 翻译研究与教学，2025(3)：9−15.
[15] 伯顿・沃森 . 我的中国梦：1983 年中国纪行 [M]. 胡宗锋，译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99−200.
[16] 王建开 . 从本土古典到域外经典：英译中国诗歌融入英语（世界）文学之历程 [J]. 翻译界，2016(2)：1−19，136.

Cognitive Differences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relude to Water Melo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 Case Study of Xu Yuanchong's and Burton Watson's Versions

LIU Jinhui, WANG Shu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with "body" (interactive experience of reality) and "cognition" (mental cognitive processing) as its core mechanisms, provides a localiz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ak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by Xu Yuanchong and Burton Watson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adopts textual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four dimensions: imagery transmission, content interpretation, rhythmic treatment,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to explore the deep-seated cognitive motivations for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poem is essentially a dynamic embodied-cognitive process based on the commonality of "physical experience" and the differences in "conceptualization". Although both translators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level of "physical experience", such as natural imagery, their expressions diverge at the level of "conceptualization" due to differing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 Specifically, Xu Yuanchong's translation lays emphasis on cultural fidelity and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to restore the literary charm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original poem, while Burton Watson's translation pursues fluency, intelligibility and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 focusing on the accurate transmission of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work. Their differentiated translation approaches and paradigms interpret the embodied-cognitive logic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jointly enrich the cross-cultural expression dimensions of *Prelude to Water Melody*.

Keywords：*Prelude to Water Melody*; embodied-cognitive translatology; cognitive differences; imagery transmission; content interpretation; rhythmic treatment; syntactic structure

责任编辑：徐海燕